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九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六五期 ——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1d）

【本刊专稿】“9·13”前后的空34师	余汝信
【读书琐记】《东湖风云录》读书琐记	黄鹤楼
【回首文革】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	安晓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9·13”前后的空34师

• 余汝信 •

近读射天狼先生《对〈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的再思考》，对其所批评的康庭梓先生有关“9·13事件”经过著述中存在的问题，颇有同感。

作为256号专机组幸存成员，康庭梓先生近年发表过不少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或言谈，据称，部分还“被党史部门存档”，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历史证言”。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康先生的文章在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同时，不仅存在着射文所批评的对某些关键问题、关键人物的推论未必客观有据及前后矛盾的不足之处，而且，在史实上也有明显的失误。如康说专机师（空34师）下辖各团番号以1、2、3、4团编列（《“9·13事件”揭秘：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即与事实不符；如又说“当时由于我国与英国之间还没有贸易往来，这4架三叉戟飞机是经过巴基斯坦引进的”（《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三叉戟256号黑匣子》），而他可能忘记了，空34师自1963年以后一直使用的子爵式运输机，就是1960年代初直接订购自英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康庭梓先生是空34师当年的飞行干部，著文本不应有类似上述这些对他来说是常识性的错误。而亦正是由于康先生的“知情者”身份，类似错误只会为人们今后重新审视本来已足够

扑朔迷离的“9·13事件”平添更多的困惑。更重要的是，空34师是《“571工程”纪要》所列入的“基本力量”，故此，今天我们将空34师这一页历史真实的一面予以还原，以为“9·13事件”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更具准确性的基础资料，应该是必要的。

一、组织沿革

1963年8月28日，经军委批准，总参谋部通知，将主要担负专机任务、直属空军领导的空军独立第3团，扩编为空军第34师（简称空34师）。同年10月1日，空34师完成整编，师部驻北京西郊机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境内），下辖空军第100团、第101团及西郊场站、沙河场站。师代号7196部队。

中共空军的飞行师，按成立先后顺序授予番号。空34师，即为空军的第三十四个飞行师，同时，它亦是空军的第二个运输机师（首个运输机师是早于1951年组建的空13师）。惟与此前成立的其他三十三个飞行师不同的是，空34师是唯一一个直属空军领导的师一级飞行部队，即使是文革中航空兵师已扩编至五十个，这“唯一”的建制关系仍然未有改变。

1963年10月，空军第102团组建于沙河机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百善公社境内），归空34师建制领导。

1964年12月，空军拟将空34师师部从西郊机场迁往沙河机场，为此，以空34师后勤部为基础，组建了空军沙河基地（副师级），将空军沙河场站改称西郊场站（拟迁往西郊机场）。但此事一拖两年多，师部、基地及西郊场站一直未能搬迁。拖延至文革期间，空司终于在1967年3月通知：撤销空军沙河基地，以该基地为基础组建新的空军西郊场站（执行团级权限），原空军西郊场站仍称空军沙河场站。那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事总要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了两年多，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1969年4月，经军委批准，空34师扩编为4个团，新组建空军第203团。1970年4月，经军委批准，将空101团与空203团番号、代号对调（番号为什么要对调？今天看也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

1969年11月，空司通知，由空34师接收原空军第1高级专科学校所属的南苑机场（1高专1968年10月已改编为13航校，后迁至山东济南），并组建空军南苑场站，执行团级权限。原驻沙河机场的空102团迁驻南苑机场（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镇）。据原1高专校长顾同舟告诉笔者，南苑机场跑道长2900米，起降条件优于西郊、沙河机场及民航管辖的首都机场（跑道均为2200—2300米），是中共建国后中外政要专机在北京地区主要的起降机场。

1970年5月，根据空司关于空军飞行部队师、团番号冠以“航空兵”字样的通知，空34师番号全称改为“空军航空兵第34师”，所属各团以此类推。

综上所述，至1971年“9·13事件”前夕，空34师所属团一级单位及驻地情况如下：

- 空100团（驻西郊机场）
- 空101团（即原203团，驻西郊机场）
- 空102团（驻南苑机场）
- 空203团（即原101团，驻沙河机场）
- 西郊场站

南苑场站
沙河场站

二、领导成员

文革前夕，空34师领导成员为：师长胡萍，师政委方中英，副师长刘发科、杨扶真、时念堂，副政委周旭彬，参谋长李征军，政治部主任李健。胡、方在专机部队的资历最深，自1952年空军独3团成立，胡、方即分别为团长、政委，1963年扩编为空34师，胡、方又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分别任命为师长、政委。惟在党内，方的位置比胡高，方为师党委书记，胡为副书记。

1968年11月11日，军委命令杨扶真调任第13航校校长。1969年2月6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王辉球命令，李健调任空32师副政委，任命空34师100团团长王进忠、102团团长尚登峨为该师副师长。同年7月1日，吴法宪、王辉球任命空34师政治部副主任马兰藻为该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征军为该师副师长，空34师政治部副主任张子甲为该师副政委，空34师司令部副参谋长曹庆章为该师司令部参谋长。同年8月30日，军委命令，胡萍调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任命时念堂为该师师长。同年11月5日，军委命令，尚登峨调任空司航行局局长。

1969年12月14日，吴法宪、王辉球任命空34师100团团团长潘景寅、101团团团长王焕今为该师副师长。

潘景寅，1964年11月起任100团副团长。1968年7月25日，空34师发生一起严重飞行事故。当日，该师奉命派出101团（直升机团）所属直升机3架，由西郊机场送来华访问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到天津杨村机场观看军事表演。代表团乘坐的2架直升机于8时15分安全降落，另1架直-5型3584号机为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3名）及空34师人员乘坐。该机在杨村西北6.5公里处因操纵系统突然发生故障，急剧下降坠机起火，直升机报废，机上乘员10人全部罹难（所以，说空34师从未发生过严重飞行事故，也是言过其实）。事故发生后，潘景寅调至101团任团长（此前团长空缺）。至1969年7月，提升该团副团长王焕今为团长，潘方调回100团任团长。

1970年12月21日，军委命令，空34师党委书记、政委方中英调新组建的空13军任政委。方这一走，躲过了“9·13”一劫。而胡萍则在方调离后于翌年1月3日由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兼任空34师党委书记，自此倒霉了下半辈子。

1971年1月25日，吴法宪、王辉球命令，任命曹庆章为空34师副师长，空34师司令部副参谋长龙振泉为该部参谋长，潘景寅改任该师副政委，张子甲兼任该师政治部主任。同年4月19日，刘发科病故。4月20日，军委任命马兰藻为该师政委。5月，空军机关借调李征军搞载人航天试验，李也避过了“9·13”的牵连。

“9·13”之后，空34师领导成员中，时念堂、曹庆章、龙振泉“隔离审查”，周旭彬被令“休息”，随即从陆军部队调进多名不懂飞行业务的师级干部“掺沙子”，师领导班子大换血。

1971年10月22日，经总政批准，陆军第80师副政委李学清调任空34师副政委。同年11月19日，经空军党委讨论，报总政批准，调空10师副师长李延良为空34师副师长兼司令部参谋长，空33师副师长孙启宗为空34师副师长。11月27日，经总政批准，

调陆军第71师副师长王明仁为空34师副师长，南京军区岱山守备区政治部主任李纯厚为空34师政治部主任。同日，军委命令，任命第13航校校长杨扶真为空34师师长，同时免去时念堂职务。1972年8月14日，军委命令，任命陆军第116师政委范维祥为空34师政委，免去马兰藻该师政委职务。同年10月，空军党委批准范维祥为师党委书记。

虽则《“571工程”纪要》将空34师列为“基本力量”，惟经自“9·13”以后多年的“清查”，并未有任何证据、任何迹象表明林立果对空34师做过什么实质性的“策动”工作，更不必说那些想象中的“策动”有什么成效。说潘景寅“很可能是长期参与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动”（京城孤魂：《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经“清查”，至1983年11月，空34师干部中结论为“犯有错误”的共12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的6人）。今天看来，那些所谓“犯有错误”的结论，也难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至于本已于1969年调离、后虽以军级职务兼任师党委书记而组织关系并不在空34师的胡萍，及他的所谓“给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的罪名，我们将另文专述。

文革期间空34师领导成员名录（1966.5—1976.10）

师 长	胡 萍（1966.5—1969.8）
	时念堂（1969.8—1971.11）
	杨扶真（1971.11—1976.10）
政治委员	方中英（1966.5—1970.12）
	马兰藻（1971.4—1972.8）
	范维祥（1972.8—1976.10）
副 师 长	刘发科（1966.5—1971.4）
	杨扶真（1966.5—1968.11）
	时念堂（1966.5—1969.8）
	王进忠（1969.2—1976.10）
	尚登峨（1969.2—1969.11）
	李征军（1969.7—1976.10）
	潘景寅（1969.12—1971.1）
	王焕今（1969.12—1975.5）
	曹庆章（1971.1—1976.10）*
	李延良（1971.11—1976.10）
	孙启宗（1971.11—1976.10）
	王明仁（1971.11—1976.10）
	田德润（1975.2—1976.10）
	李明显（1975.5—1976.10）
副政治委员	周旭彬（1966.5—1971.9）
	马兰藻（1969.7—1971.4）
	张子甲（1969.7—1971.9）**
	潘景寅（1971.1—1971.9）
	李学清（1971.10—1976.10）
	王善富（1973.10—1976.10）
参 谋 长	李征军（1966.5—1969.7）
	曹庆章（1969.7—1971.1）
	龙振泉（1971.1—1971.9）
	李延良（兼，1971.11—1975.12）
	汪克庆（1975.12—1976.10）
政治部主任	李 健（1966.5—1969.2）

马兰藻（兼，1969.7—1971.1）

张子甲（兼，1971.1—1971.9）

李纯厚（1971.11—1976.10）

*官方原始资料如此。惟资料中曹的师党常委一职任至1971.9。

**官方原始资料未提及张受“9·13事件”影响，惟据官方名录显示应受影响免职。

三、装备配置

1960年代初，独3团主要装备苏制里—2、伊尔—14和伊尔—18运输机。自1963年空34师组建后，又陆续增加了若干新机种。

1961年，经周恩来批准，从英国订购子爵式运输机6架。其中2架分配给空军，分别于1963年10月和1964年1月接收，装备空34师作为专机使用。

1966年1月，从苏联进口图—124型运输机2架，全部装备空34师。同年4月，又从苏联进口安—12型军用运输机3架。1968年再进口9架，其中1架装备空34师（其余装备空13师）。

1968年4月，经周恩来批准，从法国进口云雀III型直升机10架，全部装备空34师。

1969年12月，经周恩来批准，从苏联进口安—24型运输机第一批共5架，总参确定分给空军3架，空军确定分配给空34师。

1969年12月6日，经周恩来批准，决定从巴基斯坦和英国进口英制三叉戟运输机21架。其中15架分配给空34师作专机使用，另6架分配予民航。先期从巴基斯坦进口的4架由空34师接收，1970年8月接收3架，1971年第一季度接收1架。

“9·13”之前，作为“专机师”的空34师，主要装备如上所述，进口自“苏修”及英法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文革期间中苏关系表面极为紧张的1969年，自苏联方面的进口仍然继续进行，这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得到的。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对外坚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大国”，显然也是极大的讽刺。

至“9·13”前夕，空34师的装备情况大致如下：

空100团 装备运输机16架（伊尔—18型7架，安—12型1架，图—124型2架，子爵843型2架，三叉戟1E型4架）

空101团 装备运输机24架（里—2型14架，运—5型7架，安—24型3架）

空102团 装备运输机17架（全部为伊尔—14型）

空203团 装备直升机29架（直—5型20架，云雀9架）

即全部装备为运输机57架，直升机29架，合共86架。

据当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所录“胡萍亲笔供词”转述周宇驰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十三日七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座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

—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

上述所谓供词的真实性问题，容后另文再议。只是近日有人根据上述不实之词称“他们”“策划南飞广州时就准备拉走专机师的几乎全部飞机”（京城孤魂：《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实为不了解内情的臆断。即使如胡萍供词调动飞机共7架，尚不及空34师全部飞机的十分之一，何来“几乎全部飞机”？几架飞机，搞什么“政变”？！

四、装备性能

空34师“9·13”前后在役的各型飞机主要性能如下：

运—5型 国产仿苏联安—2型多用途轻型双翼活塞式运输机。1957年12月起交付部队使用。巡航速度160—18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1,376公里。机上乘员3人。最大载重1,500公斤，载客12人。

里—2型 苏制多用途活塞式短程运输机。巡航速度24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2,650公里。机上乘员5人。最大载重1,500公斤，载客14人。

伊尔—14型 苏制多用途活塞式短程运输机。巡航速度32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1,785公里。机上乘员5人。最大载重2,500公斤，载客32人。

伊尔—18型 苏制涡轮螺旋桨式中程运输客机。1959年投入使用，是苏制民航机在国外使用最多的机型。巡航速度65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按改型不同为4,750—6,200公里。机上乘员8人。最大载重11,800—13,500公斤，载客53—90人。

安—12型 苏制涡轮螺旋桨式中程运输机。1956年投入使用，为苏空军标准军用运输机。巡航速度55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6,000公里。机上乘员6人。运输方案最大载重16,000—20,000公斤，可载伞降部队60人或机降部队96人。可运载16吨坦克1辆或解放牌汽车2辆，或小型直升机2架。

安—24型 苏制涡轮螺旋桨式短程运输机。1963年投入使用，用以替代苏国内航线上的活塞式运输机。巡航速度45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2,400公里。机上乘员5—7人。最大载重5,500公斤，载客32—50人。

图—124型 苏制涡轮喷气式短程运输客机。1962年投入使用。巡航速度86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2,000公里。机上乘员5—7人。最大载重6,000公斤，载客56人。

子爵843型 英制涡轮螺旋桨式短程运输客机。1957年投入使用。巡航速度53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2,100公里。机上乘员7人。最大载重6,350公斤，载客28—45人。

直—5型 国产仿苏联米—4型单旋翼活塞式直升机。分客、货机两种，1964年批准生产定型，客机型1966年投入批生产。巡航速度160—18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780公里。可在昼、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但不宜在中雨或结冰情况下飞行。机上乘员2—3人。最大载重1,000公斤，载客11—15人。

云雀 I I I 型 法制轻型单旋翼涡轮轴喷气式多用途直升机，主要用于救护、联络、观测、照相。不宜在云、雨中飞行，只能在昼、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飞行。巡航速度 160—170 公里/小时，最大航程 650 公里。机上乘员 2 人。最大载重 500 公斤，载客 4—5 人。

以下，着重谈谈“9·13”前在役的 4 架三叉戟 1 E 型飞机的有关问题。

“三叉戟”是英国德·哈维兰公司（后来并入霍克·西德利公司）在 1950 年代中后期根据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EA）的要求设计的一种涡轮风扇式中短程运输客机。后发展为 4 种型别，即三叉戟 1 C、1 E、2 E 和 3 B。三叉戟 1 C 为原型机，1964 年 2 月获得适航证书，1968 年 9 月，全部三叉戟 1 C 改装了自动着陆装置。

三叉戟 1 E 基本上与 1 C 相同，装有三台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又译劳斯莱斯）RB-163-25MK511-5 斯贝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推力 5，170 公斤。增大了机翼翼展，航程较远，最多可容纳 115 名乘客。首架 1 E 于 1964 年 11 月首次试飞，1965 年 11 月获适航证书。

1 E 共获得 15 架订单，销售情况不甚理想。订户除英国国内小型航空公司 4 架（BKS 与海峡航空各 2 架）外，主要为第三世界国家，即锡兰航空 1 架，伊拉克航空 3 架，科威特航空 3 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 4 架。

1960 年代中国在南亚次大陆与巴基斯坦交好。中国在印巴冲突中倾向巴方，而巴方在中美解冻过程中亦出力良多。196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将歼-6 战机不断售予巴方。笔者认为，巴方同意将已使用了数年的三叉戟客机转让予中方，是出自可“以机易机”交换更多的歼-6，且相互间均无需支付硬通货的考虑。何况巴航当时除此 4 架三叉戟 1 E 外，尚拥有性能更佳的波音 720 型、707 型各 4 架。双方共赢，何乐而不为？而巴航的转让，英方应该是知情的，否则后继维修备件中方不好解决，而据权威的《简氏全球航空器》，西方亦很快获悉这 4 架飞机虽名义上是中国民航引进，实际上是军方在使用。

以下是三叉戟 1 E 的部分技术性能数据。

1、主要几何数据 机长 34.98 米，机高 8.23 米，翼展 28.96 米，机舱（不含驾驶舱）长 20.37 米，最大宽度 3.44 米，最大高度 2.03 米，客舱门离地高度 2.7 米，客舱门尺寸 1.85×0.71 米。

2、飞行性能 起飞重量 61，498 公斤，起飞离地速度 280 公里/小时，起飞滑跑距离 1，400—1，600 米；着陆重量 48，988 公斤，着陆接地速度 250 公里/小时，着陆滑跑距离 1，300—1，500 米；最大速度 970 公里/小时，巡航速度 900—930 公里/小时，最大航程 4，470 公里，续航时间 5 小时；升限高度 12，200 米，有利高度 10，004 米。

3、重量与载重 飞机净重 32，422 公斤，最大载重 9，480 公斤，客舱座位 86—98 个，机上乘员 9 人，最大载油量 21，319 公斤。

（2005 年 10 月）

~~~~~

【读书琐记】

《东湖风云录》读书琐记  
——“7·20事件”中的“百万雄师”

·黄鹤楼·

一次在中国文化资源和现代化的学术会上，遇到著名的文革研究者麦克法夸尔，大家偶而谈到武汉的“百万雄师”，不善汉语的他，随即幽默地做了一个庞大、凶恶的表情，学者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近20多年来，批判文革，我们谴责了1967年春夏“揪军内一小撮”风潮（——它本为与“7·20事件”相对立的后继倾向），着意赞扬和恭维“百万雄师”的话语也溢于朝野；另方面，造就事件的“百万雄师”兄弟们，除其中极个别的基层小干部跻身主流社会外，多数职工可能已坠入下岗，边缘化了。在震惊世界的武汉“7·20事件”里，他们究竟如何了？世人对于“百万雄师”在武汉作过什么，他们的悲剧在何处，早已淡漠。最近笔者读到一些新发掘的资料，涉及到事件中的“百万雄师”，特辑录和感怀于下，以飨读者。

◇ “百万雄师”的一些舆论

“百万雄师”早在1967年“武汉事件”之前，就很关注全国运动形势，研究运动走势，积极商讨对策的。就在7月19日上午，汉口某军代表张XX对“百万雄师”的成员之一“革命工人三司”的头头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这样两条内容：1、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2、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又说：“（关于江西问题的指示下达后）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浙江造反派“要去炸钱塘江大桥”；“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实际上，这种“形势分析”，7月上中旬已在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干部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头头中散布开来，直接抨击了中共中央处理各省问题的做法；当时中央处理河南问题的精神对“百万雄师”不利，这些舆论也特别有助于稳定人心。

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到武汉以后，“百万雄师”也表现了一些策略变化。如7月15日“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发生武斗后，军区支左办公室和他们的联络总站对“7·15”武斗提出批评，“百万雄师”遂暂停武装冲突，以制造和平气氛，准备对中央来人汇报情况，解决问题。也决定不在“7·16”组织渡江活动。16日造反派渡江后，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一带“百万雄师”宣传据点的喇叭也向游行的造反派学生高呼：“向二司的革命小将学习、致敬”，“向红水院的革命小将致敬”，以及“不许工总翻案”、“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口号。

就在7月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开始出现零星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标语明显地表现出对谢富治、王力的不满情绪。其实，谢、王刚到武汉48小时，15日才首次与周恩来一起听军区汇报运动情况。16日深夜，谢、王去了“百万雄师”的总部，批评了他们，消息在次日迅速传达到各级头头，就有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独立师的）翁某在下面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后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个讲话应收进文革话语精粹选编，他仅仅是一个普通军官，但讲的十分准确彻底，表达了当时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干部对文革路线的严重不满，也十分准确地预告了即将发生的揪斗王力事件。因为，当时周恩来还没有对军区作总结性的表态讲话，提出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处理要点；王力



也还没有到武汉水电学院发表对造反派热情赞扬的讲话。按翁某天才性的预见，武汉形势变化，抵制和揪斗王力、独立师失控是必然的。

对于周恩来和王力的舆论，在独立师团级干部里正式传达、散布，是在7月18日晚上；8201部队的蔡政委回去传达军区会议精神，把当天下午周恩来讲的四点精神，说成是王力的“四点指示”；必须强调：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公开到军区、宾馆和街上闹事，就是利用渲染了假借王力作替身的传言。蔡还说“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

特别蔡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师长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这些奇怪消息很快就传到“百万雄师”普通群众中，对于基层群众来说，更是火上加油。顺便说明，“王力是国民党员”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王力行时和倒霉时，都在某一政治层里流传。这也算是一种特别的政治斗争吧。到了事件发生，“百万雄师”已在武汉三镇写出重头标语：“王力、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在纷乱的群众里，甚至有个别人提出“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中央文革也会犯错误”。甚至有人说：“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话虽出自个人，就当年时局而言，应是准确和尖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涉及“恶毒攻击”的这些“百万雄师大黑话”，在文革以后，变成了针对性极准确的抵制文革大红话！一个普通持“百万雄师”观点的群众口里，居然讲出了十几年后——并持续了好几十年的武汉文革结论性的话语！我们不要低估了文革的群众与中央的互动功能；即群众言行对于运动的能动作用。

在7月20日事件发生时，“百万雄师”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指出：“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按：湖北省前副省长）的学生，是王任重（按：湖北前省委第一书记）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要研究“百万雄师”，很难找到他们的报纸、文章，但这类似是而非的谣言和耸人听闻的口号，言简意赅，影响极大。是文革政治文化的一种典型体现。

事件发生后，甚至街上突然出现系列的“毛泽东语录”：“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

◇ 还有形形色色的“北京来电”：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

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作为他们的头头，当然知道这些“指示”和“来电”都是虚幻的东西，但这正是他们内心的需求乃至渴求。街上如痴若狂的普通要革命的群众，靠这些谣传支撑了数日。文革中的群众，塑造与追求的是自己心目中的真理。“百万雄师”的舆论在事件的激发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难怪7月27日中共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信曾指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途”，就指的这个舆论问题。在19日“百万雄师”到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要求谢、王澄清中央是否有“四点指示”时，他们一直将他们所听知的“指示”精神说成是王力讲的。这完全是一个造舆论的小技巧，延续至今，多数研讨文革的严肃文字，居然也借用当年“百万雄师”的宣传思路，说王力在造反派里泄露了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精神，从而激化了两派的矛盾，引发了事件。这是在历史研究的泱泱大国，党史和文革历史述说里十分奇怪的事。实际上，在7月18日当晚，独立师的领导就将周恩来讲的精神传达到团级干部，并说了十分关键的一句话：“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目的是：不致把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但借打王力足可对抗中央。

如果他们的宣传公开告诉武汉军民，那四点精神就是周恩来说的，甚至是毛泽东授意的，“百万雄师”完全可能就采用其他的非暴烈方式向中央表达自己的意见。

#### ◇ 事件前后的一些行为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在中央办的湖北省学习班里不得不承认：“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他这里检查的也是事实，而且“百万雄师”的武斗已经到了专业化和程序制度化的地步。后来支左办公室就指出在周恩来与军区干部谈话时，周曾出示了“百万雄师”搞武斗调兵的“调令”。中央来人到达武汉以前的武斗不需赘叙。就在周恩来和毛泽东到汉之后，7月15到25日几天里，武汉就发生系列由“百万雄师”挑动的大型武斗和围攻。

15日，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区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同日，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在汉口游行（不是现在一些文章说的“欢迎北京来人”），“百万雄师”硚口区三分站等候市总站命令，硚口区站头郭某亲到分站部署。在武胜路电车公司埋伏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张某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伤工人学生多人。研究者王绍光说，造反派死10人，37人重伤，80人轻伤。

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东湖，周、谢、王在听军区汇报运动情况。

20日，在揪斗王力和武装示威的过程里，“百万雄师”大打出手：在武汉三镇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口号声下，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武汉钢铁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留守的造反派学生、教师。在游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马路和单位里的群众，一旦被入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毒打，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这仅仅是向中央要个说法吗？稍明事理的人都会指责这是反文明的恐怖！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下午，冲击湖北大学，并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200余人被关押。一些中学校受到

洗劫。深夜，“百万雄师”电话不断打到水电学院总机和其他院校，威胁道：“二癞子（按：对二司学生的卑称），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

24日，中央台业已广播谢、王回到北京消息。“百万雄师”发起对体育学院和测绘学院的攻击。攻打体院的“百万雄师”约一万多人：晚上，18车人马包围体院大楼，进驻测绘学院和新华工的空军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5时，“百万雄师”再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次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 ◇ “百万雄师”策划揪王力的作为

19日晚，“百万雄师”以看戏名义集中了东湖地区和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到九点，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附近皆被控制，两条通道被层层封锁。

反映“百万雄师”内部运作可以参考当事人的回忆：

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设在3506厂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见一辆汽车站满人正准备出发，总站头头杨道安叫“小汪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大家不负众望，把工作做好。已分了工的开始行动，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未落实，谈判时要做好记录”。（以上根据汪本人写的回忆录《“七二零”揪斗王力录音的回忆”，辑录自回忆录《波澜岁月》，2002年印刷内传）

可见，按联络总站的策划，当晚他们的初衷确实是要求谢、王接见，和王力谈判。

夜里，“百万雄师”武昌指挥部将流传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电告下属的“武重红联”，武重又将情况通知东湖分部。凌晨，武昌指挥部再次通知“待令”，说“部队内部已经造反了”。与此同时，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8201作战部长孙某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东湖“园艺军”并受命控制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

子夜，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在政治部值班，听“百万雄师”的人在军区机关往外打电话，叫派车到东湖去拦截和揪王力，当即汇报到政治部钟副主任，又汇报到张副参谋长。

零时30分许，“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十多人，乘车冲到客舍北门，被哨兵阻拦。他们说：“要见谢部长，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谢部长是合情合理的。”“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军管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管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是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等等。并扬言：“谢部长今天晚上不见，天亮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暴露了这里的目标，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警卫正告：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来人竟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

1点20分，重型机床厂已经将武装的“百万雄师”集结，广播高叫“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强烈要求中央首长深入下层了解情况”。

2点，成百卡车冲进军区，在军区食堂8201与百万雄师开会成立“临时联合代表团”，组织与王力谈判与辩论。会上《百万雄师》还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其“专揪王力指挥部计划”如下：1、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2、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3、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4、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5、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指挥部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一人，《红旗联委》一人，省直联司一人。事后，军区支左负责人答应调宣传车，某副参谋长与“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从这些情况看，由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协调两和组织了与王力谈判和辩论的事宜和整体部署，初衷似是以王力为人质，要中央再来人解决问题，参会人员，似乎并不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武汉处理问题。

会议大致只开了一个小时。汪洋的回忆说：“我们在食堂等到深夜三时左右，余均才同志通知我们便转到对面一栋楼房会议室内，这就是谈判的地方”。汪本人不是市级头头，并未参加指挥部的会；得到通知去会议室，会议结束，开始动作了。

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百万雄师”园艺军东湖分部（属于东湖管理处）头头雷荣华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彭、唐、毕、王某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要见谢、王。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但刘贤寺叫“不出去”！雷也大叫：“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谢出来，“我就是谢富治”；谢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后在陈再道建议下，谢、陈与来人在外面草坪上谈话，气氛渐渐和缓起来。最先冲进院子里与谢、王接触的，是宾馆内部工作人员和东湖管理处的“百万雄师”群众。一些带头的人情绪冲动，言辞极为强烈，而群众还是想找谢、王反映意见，也是听取陈再道和谢富治招呼的。

5点40分，又从西门冲进三车人，包围了百花二号，并径直向二号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蒙住脸，叫喊“我们要见谢富治、王力，叫他们出来”！后来又冲进的一批端冲锋枪的独立师战士，他们把长矛和枪口对准谢、王，气氛再度紧张。接著，又冲进来由一个副营长带队的8车8201、8199和院校学员，有人以为陈再道是王力，挥拳、持枪殴打陈，将其打倒在地，后来，又殴打王力和其他北京来人。乱中，他们把王力拉走架上汽车。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被拉走游街，王力则被拉进军区大院。时间大致是早上七点左右。

凌晨这次冲击，是事件转化的关键。武装的“百万雄师”——特别是武装的部队战士，是按军区食堂会议的“专揪王力指挥部计划”行事并达到预期目的。不过，请愿行为变成失控的群体性暴力抗争行动，也在策划者预料之外。

从以上情况看，当晚“百万雄师”的行动是有组织和计划的，市、区两级和各个分站有分工布置。不过他们开会布置的初衷，还是找谢富治、王力接见与谈判，要求给他们一个满意的说法。从多种迹象看，当晚他们仅仅知道谢、王驻地，并不知道毛泽东也在东湖。

.....

#### ◇ 军区大院批斗王力

9点左右，王力被“代表团”揪到四号楼，军区支左指挥部派人找“代表团”参加旁听，还提供了录音机录制实况。在场安排硃口区分站录音的当事人汪洋也记载了：“上午九时左右，王力被汉阳《百万雄师》的同志们关照在三楼会议室，大楼外保卫森严。我印象是王力40多岁，中等身材，体形白胖……气质不凡。这就是‘四人帮’的爪牙，反党乱军的头目，武汉造反派的亲人，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而今为之一扫，正义压倒了邪恶”。“根据当时军民的要求，由《百万雄师》刘敬胜同志陪同王力，并保护他到四楼楼梯边的房间阳台上示众！这时群情激愤，打倒王力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王力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说：‘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作者撰写于2001年的原文如此，未加修改）。

汪的回忆基本是准确的。有造反派学生，换上“百万雄师”或“红卫兵”袖章，混进军区大院，目睹了现场和在阳台批斗王力经过，他们当时看见和听见的也是如此：众人反剪著王力双手，将他推到四号楼二楼平台，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汪的回忆记载了批斗现场的群众是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头头是市级总站的刘敬胜。

在军区大院二号楼3楼46房，“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著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百万雄师”和部队肇事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要王力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组织的性质表态；钟汉华、叶明政委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作揖、磕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也揭发说：钟……没有原则，没有风格，向人家（指“百万雄师”的人）磕头下跪求饶。“百万雄师”群众看不起，说“你简直不象话”。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从以上情况看，批斗王力现场尚未完全失控，在场人员，主要还是按批斗指挥部拟定计划，要王力对武汉重新表态，要求他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流传出来的“四点指示”澄清有还是没有。问话者拿的是事先准备的字条，他们当时怀疑的仍是“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从主观愿望讲，他们不希望中央真有批评军区和“百万雄师”的什么指示精神。失控，主要是武汉军区对肇事部队和群众的失控，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局面从群众和战士刚冲进宾馆，已经出现，当时陈司令对谢富治说自己无能为力了，现在就看你们做工作了。揪走王力以后，钟政

委叫29师的张政委和秘书，把刚印刷好的检讨（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布告），在澡盆里全部烧掉。后来，周恩来在北京急令军区把王力救回来；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不知武汉出现什么问题，急电陈司令要求放王力，陈回答说他没法，表示无奈。

军区当时把29师的张政委和部分战士调到现场，让张劝说揪斗指挥部的头头，要他们放了王力，有什么问题与军区商谈，头头个个“满腔义愤，以不向王力讨回公道决不罢休的怒气”，不予接受。对此乱局，军区一位老首长看了很不满意，对在场群众说，“这样搞怎么行，反革命，给我抓起来。”当即引起群众一齐高呼“打倒”。叶明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向揪斗王力的头头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派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不料，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使不知此情的29师政委大吃一惊。（见当事人张昭剑2002年给杨先财、石仲泉澄清当年事实真相的信）

这个头头是谁，后来自然也没有去查明。但这个果断的话语，决非个人偶然之言。因为在下半夜的指挥部会议上，已决定不去北京，但那时似乎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武汉。几个小时以后，毛泽东在武汉的绝密消息，至少已在独立师与“百万雄师”的最高层里悄悄传出。确实耐人寻味，是什么人传出？目的是什么？几乎同时，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张根成被抓到独立师师部，见政治部某主任走进来就问蔡政委“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示意不要讲，某主任还追问“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张听了，心里想“这不是造反了吗”？毛泽东在武汉的消息，独立师的领导已经知道（但被临时调来保卫宾馆和军区机关的29师政委没有听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当年，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不会称毛泽东为“老头子”的，那确实是大不敬的。这个对话，反映出来说话人对毛泽东本人业已存在的极为不满。今天平下心来说历史，完全不需要给谁带什么“存心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说当年他们就是针对毛泽东搞什么“反革命兵变”。今天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言行业已成为时尚，不需掩藏；我们客观认为：独立师部分高级军官的不满，决非王力，也不仅仅是周恩来了。在决策者心里，就是针对的毛泽东。今天关心者总爱问：“百万雄师”知不知道毛在武汉；在20日，知道与否已经不是关键了，况且头头确实也已知道毛泽东就在东湖，周总理的讲话，就是毛的意图，群众仍在围困东湖，实质就在对中央施压了。

#### ◇ “720”武汉街头简况

在当事人汪洋的笔下，是这样记载和纪念武汉7月20日的：“7月20日，在历史上是个伟大的日子。大街小巷人流车流如织。‘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打倒王力的口号震撼江城。武汉愤怒的人民如滔滔的江水滚滚向前，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正义的人民。1967年，7月20日，迄今已34年过去了，岁月冲淡不了这一伟大的革命壮举。回忆武汉工人阶级有著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不畏权势，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敢与‘四人帮’一伙作殊死斗争的伟大革命精神，将记入党史和武汉工运史册，《百万雄师》的功勋业迹，永放光芒”。

“百万雄师”“园艺军”冲击东湖宾馆的头头雷荣华，上午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说：“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这天，他们都充分感受到了暴烈宣泄、造反的极度快慰。

武汉造反派当年是这样记录下来的：

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大量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也播放起《造反有理》的毛主

席语录歌。军区大院敞开，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进进出出。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說“……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人群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大东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說“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武汉测绘学院贴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著“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另有有心人统计，是日共出动车辆482辆。

消防车拉响警报，凄厉的警报声响彻三镇上空。“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著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說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說“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說“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說“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百万雄师”也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某当事人說，省直机关的保守组织，发表声明公开参加游行，但也有不少思想保守的中层干部，对“百万雄师”和部队的暴烈造反行动表示犹疑，担心这样是炮打中共中央，没有上街欢呼与赞同。一记者尽管赞成“百万雄师”口号，起先参加街头游行，但也认为有问题通过组织解决，不要群众上街为好，王力有问题也不是群众說打倒就打倒的。

14点左右，有百余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击王家墩机场，来人带著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直冲塔台，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一个8201的人說：“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說，三点钟从北京起飞”。驻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机场空军立即向空军司令部报告，转告北京，通知总理的飞机转场降落。又出来做群众的工作，指出“冲击军用机场是错误的，要防止被阶级敌人利用。你们应该立即撤出去”。到17点，人群方撤走。

在武昌，下午东湖宾馆仍被几万人围住，谢富治、余立金打电话给陈再道，說“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秘书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說：“现在你们该撤了”；“百万雄师”才撤了。（按：所以深夜毛泽东离开东湖，没有与“百万雄师”遭遇）

## ◇ 百万雄师的后续对策

20日当晚，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二、“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三、“全面夺省市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三司两次冲进29师，胁迫交出王力，并要求搜查。

21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大会，其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的权……”。

下午，“百万雄师”的“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知情人说毛泽东的一个专列原来停放武昌的徐家棚支线，但“百万雄师”为了截王力出走，把铁路控制了并扬言要扒路轨。

21日的15点40分，“百万雄师”汉阳分站蔡XX带领上千人，26辆车冲击山坡机场抓王力。负责警卫的8201部队战士，出来劝说闹事群众：“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来没有冲过。你们两天内冲了两次，这是什么问题”？在陈司令让秘书打电话，说“你们应该撤了”后，冲击山坡机场的“百万雄师”于16、17点多撤走。

晚上，“百万雄师”总站头头纪登清向8201师部打电话，负责与“百万雄师”联络的郭XX接电话，纪说“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郭说“你给我谈谈不行？”纪说不行，要蔡政委。把蔡找来，他们进入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次日，蔡与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6团，对团副政委张某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8201为核心”。

22日，全市“百万雄师”继续游行，出动车辆约1500辆。上午，独立师蔡政委接见省直“百万雄师”头头，要求准备材料到北京谈判，特别是所谓工人总部“保王任重”的材料。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由于大势已去，这个由个别人策划的行动没有实现，后几日，只有零星“百万雄师”人员乘车北上，在河南境被阻拦。

到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回到北京和北京欢迎的消息。武汉全城舆论大哗。造反派奔走相告，纷纷从逃避处所回到单位，“百万雄师”与8201部队战士思想出现混乱。“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空15军的部分部队和8199部队开始控制城市主要交通要口，与8201部队换防，逐渐控制市内重要制高点。



24日黄昏，“百万雄师”一万多人攻打体院，攻击队伍的前头已经到达了体院，尾部还在汉阳。

25日，“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同时，“百万雄师”也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和“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口号，表达了中央广播后的策略变化。

在武汉事件发生之后，“百万雄师”的上层组织机构依然有一整套计划，与中央可能的措施对峙，他们把街头的活动，仅仅做为一个手段，甚至幼稚地以为可以就此夺权，肇事的独立师主要领导参加了这些活动。但在中央对武汉事态表态以后，“百万雄师”的势头立即消退，广大群众开始公开怀疑前几天的行动是错误的。部分上层人员研究了暴力抗争，但未能付诸实现。大批武装“百万雄师”对体育学院、测绘学院的围攻，受到造反派的武力反抗，也受到由周恩来调入的空军部队的制止。暴力反弹还是局部的。

研究武汉文革的学者王绍光撰《理性与疯狂》调查认为：“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开始，“百万雄师”总部决定，只要毛和（或）林没有公开表明其观点，该组织就不投降。然而，林彪在7月25日出席天安门大会使他们的幻想破灭。虽然仍有少数人猜测毛肯定已被林软禁，并发誓，除非毛亲自责难“百万雄师”，否则就要战斗到底。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下面是他采访与记载的“百万雄师”一个分部开会的会议记录摘要，它反映了“百万雄师”群众的情感在那些日子是多么的矛盾：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著死，不愿跪著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结论：不管通不通应该立即贯彻中央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27日，“百万雄师”最后解体。在最后关头，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因此，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几天后，“百万雄师”的13名主要头目被捕，其中8人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一人死于狱中。

公安部门后来经过系统调查在当年报告说：

“7月26日他们坐上八辆公共汽车狼狈逃窜，先跑东西湖，东西湖有广播。又跑到肉联，肉联也有广播，最后跑到姑嫂树黄家大小湾一带。在逃跑之前，他们曾经开了紧急会，说中央已经表态，坏头头要打倒，于是就把原来出头露面的人物作为一线，其他的作为二线潜伏下来，伺机活动，主要任务有三条：（1）派人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家乡去发动贫下中农闹事，向北京递告状材料，这个手段很毒辣；（2）派人立即去北京告状；（3）如果上两条不能实现，就继续蒙蔽欺骗郊区的农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

“他们逃跑的过程很狼狈，跑到黄家大湾一个地方就丢下十九部话机，三匹绸子的袖章、

长矛、枪支等，有些匪徒半路溜掉了。第二线的人由 8 2 0 1 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点。作战部长在汉阳十里铺进行秘密活动，计划成立《江城飞虎队》，准备搞枪。他们的罪恶计划很快被发现，经过武汉警备区同意，我们去那里抓了他们，在回来的路上，这位作战部长不老实，想抢枪，我们的战士发现开枪，身上中了四弹，送到医院后这个坏蛋自作自受了。还有三、五个人一起偷偷活动，这些人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他们再一个斗争方法就是写反动标语，向报社电台写匿名信，矛头对准我们伟大领袖和我们的副统帅，这些反动传单在东西湖发现多一些。

“这个组织现在是基本上已土崩瓦解分崩离析了，有个别顽固的跑到东西湖、黄陂等地，也有的跑到通县、通城等地。绝大多数已陆续回来，在外面的寥寥无几。二线的头头大部分已经向我们自首”。

另有公安部门造反者回忆：“百万雄师”围攻过许多单位，杀死杀伤群众无数，但是这些杀人血债从来就没有被清算过。

“7 2 0”之后“百万雄师”江汉区作战部长陈昌文起义过来，揭发了内部一些关键人物的罪行，“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名字叫汤忠云，是武汉多起血案的策划者和制造者，1 9 6 7 年六渡桥 6—1 7 血案，6—2 3 围攻武汉水运学院，6—2 4 血洗工造总司，都是他亲自策划和指挥的。他还把人民仓库的代鹏从家里捉到“百万雄师”的据点——武汉市委大院，亲手杀害，杀后把尸体埋在市委大院里。“7 2 0”之后陈昌文帶著公安机关和武汉警备区的人去市委大院的树林里，把尸首挖出来火化了。之后，汤忠云还在准备搞地下斗争，要抢夺粮食打持久战，当时武汉市公安局请示武汉警备区同意，就由陈昌文带路去捉拿汤忠云。公安局 9 处彭海如处长下令把汤忠云缉拿归案，铁路刑警队长刘祖清，9 处的警察王正友带人去抓捕汤忠云，汤忠云逃跑过程曾经鸣枪示警，在快追上的时候，汤回身夺王正友的枪，这样的情况下王正友和刘祖清都开了枪，汤忠云中弹受重伤，送到武汉市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清队（按：武汉的清队工作在 1 9 6 9—7 0 年开展）的时候，当权派在报纸上把汤忠云树为英雄，追认为烈士，还把他的儿子安排到铁路上工作。最后当权派还把这三位执法警官送上法庭，说彭海如负有领导责任，被判 3 年有期徒刑，开枪自卫的警官刘祖清判了 8 年，王正友判处 6 年有期徒刑。

“百万雄师”区站宣传干部汪洋在他的《波澜岁月》里对此也做过回忆，大意说“百万雄师”内部出了叛徒，将公安人员引到汤忠云隐藏的地方。

注：本读书笔记的有关内容，主要根据《东湖风云录》披露事实（编著徐海亮，银河出版社，2 0 0 5）。

~~~~~

【回首文革】

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

• 安晓意 •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 3 0 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 8 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 5 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阎长贵先生的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由于解放，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出身，195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学习。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但是阎先生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先生，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一篇习作，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中国青年报》约他开座谈会，文章被收录进1963年出版的《报刊评论选》，还有人写文章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当时阎先生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做了批示。30年后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了当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阎先生做了两年多学术研究，1963年秋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先生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阎先生坦诚地说，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也很积极，认为夺取政权没赶上，但保卫政权可不能落后，所以紧跟形势和舆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在当时认为都是对的。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这时的阎长贵已经不是一个刚毕业几年的普通大学生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权力机构，同时也迈进了一扇日后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没人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一开始每天几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群众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直接由戚本禹领导。阎每天挑选七、八封或十余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省、市委、部委，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的印象不错，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带答不理，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20多天以后，江青才找阎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认为自己支持的这派受压，想让江青为这

派说话。戚本禹派阎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马上争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将信重抄一遍，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务你都不再接受（阎感觉到，江青显然看出了这件事是别人让他做的），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从这件事以后，阎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理信件，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江青曾对阎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所以，阎每天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她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阎先生说：“惟独1967年我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北京。所以我既没坐过专列，也没坐过专机。”这一年是江青极力往上爬的一年，给人们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小心谨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没有为难他。客观地说，江青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无论是报告或是发言，绝大多数都亲自拟提纲，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阎长贵给江青当了一年秘书，从没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别人告诉阎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阎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对她的这番话摸不着门儿，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受到了一些攻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对阎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前几天，阎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在1975年给阎长贵的结论中，就因这封信而定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处就是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对江青来说，阎长贵这位小字辈也在劫难逃，阎长贵的厄运从此开始。

事有凑巧，当时比阎稍晚些时候和阎共同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录父亲病危，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不敢打搅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同意杨回家看望父亲。杨一星期后回来，阎领他去见江青，江青对阎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陈伯达、汪东兴找阎谈话，陈伯达说：你还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东兴说：要例行手续审查一下，阎从钓鱼台11号楼被带到钓鱼台北门警卫连的一间房子里，暂时关起来。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

阎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随身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干什么呢？阎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感到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第4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江青当时的“气派”和“威风”。阎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悬一线的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年后，阎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写到：“若问原因？我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这在当时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阎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他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阎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的脑子里无时无刻地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儿，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呵，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阎先生保存至今的这本当年林彪赠送的《毛选》，封皮已经翻卷，破得几乎拿不起来了。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先生说：8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1975年5月阎被宣布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农场职工只知道阎是一位特殊人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刚释放过一批战犯，猜他是战犯太年轻，作家体验生活也不太像，尽管猜不出他是什么人，但是农场职工，还是热情地接受了阎先生，处处予以关照。1975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先生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开始教数学，后来教政治，又当了中学校长，一年后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先生于1979年9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当我问阎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时，他脱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后绝对不能再搞了。但是，为什么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怎样避免‘文化大革命’？这却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而现在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禁忌，实在是不应该的。”

□ 《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